



YISHUKUJIBANDI

艺术·快感·磁力



范印华
林建公

国防大学出版社



2 020 6479 1
0021442

艺术 快感 磁力

——思想工作方法谈

范印华 林建公



国防大学出版社

艺术 快感 磁力

——思想工作方法谈

范印华 林建公

*

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新华书店经销

解放军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375印张 220千字

1988年11月第1版(北京)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册

*

书号: ISBN 7-5626-0094-5/D·29

定价: 3.50元

作 者 的 话

思想工作是一门科学。它不同于其它学科，涉及面宽，容量大，大凡人事科学都包含着思想工作的内容。尤其是灵活多样的思想工作方法，在我们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中更是俯拾即是。其中有许多好的传统作法，既符合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活动规律，又富有深刻的哲理，妙不可言。我们在工作之余，既留心现实生活中的事理，又翻阅了大量书刊，把那些具有艺术性，又能引起人们快感的事例汇集起来，加以纵横捭阖，悉心提炼，力图用哲理性的语言，将思想工作方法阐述得更生动活泼和富有趣味性、吸引力，给思想工作者以新的启迪，更好地适应我国改革、开放、搞活和部队建设的需要。书名定为《艺术·快感·磁力》，也就是追求的这个效果。全书共60个题目，每题讲一种方法，说古道今，探求解决新问题的蹊径，使之更贴近大家的生活和工作实际。但是由于作者业余笔耕，水平所限，文中肯定有不当之处，恳请读者不吝赐教。责任编辑郑克礼同志，尽心尽职，早晚披阅，为本书出版付出了大量劳动，在此谨表谢意！

1988年5月10日

目 录

桃李不言蹊自成——言教与身教	(1)
贵以长善救其失——长与短	(6)
明者防祸于未萌——防与治	(11)
科学预见是事实——立与废	(16)
洒向心田都是爱——严与爱	(22)
强者必不怒于色——言与色	(27)
迷津可渡思为舟——言与思	(33)
抚琴不弹亦有音——堵与疏	(39)
未成曲调先有情——情与理	(45)
春江水暖鸭先知——知与行	(50)
人间鼻子皆不同——同与异	(55)
凉水泡茶慢慢浓——急与缓	(59)
笛里应知壮士心——知面与知心	(64)
必先严己而后人——严人与严己	(69)
应唱新翻杨柳枝——继承与创新	(74)
万家忧乐注心头——义与利	(79)
雨打沙滩万点坑——大与小	(84)
一言为重百金轻——言与信	(89)
物到极时终必变——适度与过正	(94)
瓜熟蒂落莫强摘——动机与效果	(99)
松柏之地草不肥——教育与环境	(104)

头有病而足取之——此与彼	(109)
风流不在谈锋胜——听与说	(115)
文似看山不喜平——曲与直	(120)
不信东风唤不回——难与易	(125)
“顽石”“黄金”一“点”间——内因与外因	(130)
“红杏出墙”非偶然——必然与偶然	(135)
智者求实不求“花”——形式与内容	(140)
江流曲似九回肠——前进与曲折	(146)
古来得失常相随—— <u>失败与成功</u>	(151)
退后一步自然宽——忍与争	(156)
“良方”尚须自己开——他教与自教	(161)
人皆可以为尧舜—— <u>先进与后进</u>	(167)
为有源头活水来——输出与输入	(173)
必见其利弊之因——原因与结果	(179)
开弓没有回头箭——首因与后力	(185)
一民之轨莫如法——情与法	(190)
旅雁还应厌后行——期望与实现	(195)
直挂云帆济沧海——理想与现实	(201)
不恃权力自有威——权力与权威	(207)
世间无事不可度——定性与定量	(213)
清冰一片光照人——公道与偏私	(219)
解铃何必系铃人——直接与间接	(225)
何处春江无月明——奖与惩	(230)
说嘴郎中应自羞——务实与务虚	(236)
眼界无穷世界宽——先进性与低格调	(241)
本不固者未必危——思想性与知识性、趣味性	(247)

心有灵犀一点通——明示与暗示	(252)
月点波心一颗珠——多与少	(258)
弹人心上之弦索——逆反与共鸣	(263)
草色遥看近却无——教与乐	(269)
重裘非一狐之白——个体与群体	(275)
前事遗亿两相宜——记忆与遗忘	(281)
刚柔相推而生变——刚与柔	(286)
莫蔽一曲暗大理——全面与片面	(292)
红花绿叶两相扶——主与次	(297)
玉石相似而异类——现象与本质	(302)
桔生淮北亦为桔——借鉴与套用	(308)
江河奔流无歇时——动与静	(313)
万物兴歇皆自然——规律性与能动性	(318)

桃李不言蹊自成

——言教与身教

众所周知，言教是思想工作的基本方法。古有“话是开山斧”之说。“言教”有一定的感召力、影响力。

然而，有时言教也会失去其神奇的“魔力”。有的同志振振有词，侃侃而谈，人们却吭鼻子撇咀，脑袋摇得象拨浪鼓。为啥？不禁想起了《看山阁闲笔》中的一个故事。有个县令刚刚上任，就制做了两幅烫金哲联，悬挂在衙门两边。上联写，“得一文，天诛地灭”；下联书，“徇一情，男盗女娼”。谁知，馈送金帛者颇多，无不收受；土豪劣绅犯罪，也无不徇情，还偏偏搞一幅堂而皇之的哲联装潢门面，自欺欺人。思想工作何尝不如是。如果讲的是大公无私，却利欲熏心钻钱眼；讲的是端正风气，却托人弄脸“扒窗户”、“走后门”；讲的是艰苦奋斗，却乐哉悠哉地贪图享乐，这怎能不令人作呕呢？可见，服人不全在“言教”之中，“身教”占的位置更重要。

其实，古人早就深谙身教之道。姜太公《六韬》说：“将不仁，则三军不亲；将不勇，则三军不锐；将不智，则三军大疑；将不明，则三军大倾；将不精微，则三军失其机；将不常戒，则三军失其备；将不强力，则三军失其联。”诸葛亮在《将苑》中写道：“夫为将之道，军井未汲，将不言渴；军粮未熟，将不言饥；军火未燃，将不言寒；军幕未施，将不言困；夏不操扇，雨不张盖，与众同也。”孔

子有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司马迁则讲：“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史记·李将军列传》）这都阐明了身教的重要性。李广死时，所以全军皆哭，百姓闻之，皆为垂涕，就是因为李广将兵，凡绝乏处，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年轻将领陈玉成，十九岁就独当一面指挥全军，将士同心，三军用命，就是他身先士卒，亲冒锋镝，与众同也。事实说明，以身作则是无声的命令，往往比有声的命令更有号召力，更有权威性。

世势虽异，古今同理。一位中央军委领导同志这样说：“以身作则最具有说服力、号召力。”一位哲人这样说，“是星就要有星的位置，是光就要有光的辐射。”一位戏剧大师这样说：“既然演了武生戏，就要背起靠，插起旗。”一位指导员这样说：“思想工作一半靠说，一半靠做。”一位厂长这样说：“思想工作不能‘未曾开口人先烦’，而应‘未曾开口人先服’。”这都是经验之谈。在东港船厂曾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六幢住宅楼竣工了，分房方案还未形成，群众就议论开了：“当官的想私分了！”“他们拖着不分，是不是在耍花样！”“共产党员不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吗？看他们这次是在前还是在后！”分配住房名单公布了，大家见群众优先，技术人员优先，十几名厂领导干部只有一位副厂长分到了住房，又是一番议论：“咱厂的领导就是过得硬，办事公道哩！”“党员带头，真不是一句空话，我算是服了！”看来，教育者如果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发出了光的辐射，做出了样子，人家会“未曾开口人先服”的。相反，如果光打响雷不下雨，光敲梆子不卖油，或者象阴阳先生说的一个样，做的一个样，那就难免台上你讲人，台下人讲

你了。即使你讲的道理很正确，恐怕也会叫人倒胃口的。可见，言行相济，则一言九鼎；言行相悖，则一文不值。

“无声语言”胜“有声语言”，在于“无声语言”看得见，摸得着。因为一般说来，人们认识和接受真理，都是耳、眼、脑并用——不仅听你怎么讲，而且看你怎么做，再想想是否真有道理。教育者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时无刻都在对被教育者起着无声的教育作用，这就是所谓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从哲学的观点讲，作为认识对象的客观事物都是具体的。人们的认识总是从具体的、个别的事物入手，首先感知的是具体的事物，然后再经过思维加工，从中抽取出事物的各种本质属性，认识上升到理性抽象，再在思维中把事物的各种本质属性统一起来，从而获得对客观事物具体的、全面的、本质的认识。教育者“授业解惑”的过程，也正是从具体到抽象、从个别到一般的过程。战争年代，人们从“朱德的扁担”、“贺龙有盐同咸”、“刘志丹受罚挑水”等具体事实中，看到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官兵平等。和平时期，人们从“徐特立排队看病”、“周总理进民宅”、“毛泽东逢年过节为工作人员服务”等具体事实中，看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公仆”精神。在老山前线，某部共产党员做到了“热让风、冷让被、饥让食、渴让水、病让药、防炮让洞。”党员“六让”的实际行动，使某部政治部门几天之内就收到3000余份入党申请书。上面几乎都写这样的话：“党员的‘六让’使我们认识了党。”可见，被教育者往往是通过你的具体行动，来判断你的思想品质。行动无声胜有声的奥秘也正在于此。

以身作则，还是那句老话：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率先做好，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比如，你批评好人

主义，你就不能“上下言好事”。你批评拉拉扯扯，你就不能“以物易物”、“等价交换”，搞庸俗的“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哲学。你讲纠正不正之风，自己就不能心眼不正，屁股不净，见礼眉眼笑，见酒走不动，等等。但是，把语言化为行动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甚至要“乱其所为”。这就要求我们，时刻把自己摆在普通一兵的行列里，一举一动都处在群众的监督之下。做到“不墜青云志，常怀公仆心”。切不可以“长官”自居，在自己和群众之间人为地掘一道鸿沟，树一道高墙，津津乐道“我说你听，我打你通，我令你行”，满足于群众一呼百应，自己说一不二。岂不知，这是封建家长作风的积淀物，是以身作则的惰性力。长此以往，群众就会百呼不应，自己也会说一不一的。

强调身教，并不倡导事必躬亲。身教的目的，在于通过把语言化为行动，为被教育者树立起行为的楷模。因此，教育者不能满足于自己当一个“普通劳动力”，把“群众身上有多少土，干部身上有多少泥”作为身教的代名词。同时，也没有必要号召部属跳迪斯科，自己就去带头跳迪斯科，或者部属设摊街头高声叫卖，自己也去叫卖。也无须为某些事没去“躬亲”而自愧。如果那样，又失之偏颇了。强调身教，并不否定言教的重要性。言顾于行，行顾于言，言行相济，两教并行，才能达到思想工作的最佳效益。道理很简单，对某些人来说，“其身正”确能“不令而行”；对某些人却不能“不令而行”，而只能通过言教“有令而从”。也就是说，言教与身教两者不可偏废。固然，把语言化为行动不易，但把行动化为语言也不是易事，它需要宽阔的胸怀，广博的知识，敏感的思维，真挚的情感，谦诚的态度，和谐的语调，精湛的语言，以及较强的摄取力、理解

力、概括力和记忆力。还须指出的是，不能片面理解“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要求干部无论大事小情，都得“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否则就说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这就不对了。瓜无滚圆，人无十全，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如果以“其身不正”作为“不能正人”的藉口，那无异于取消了言教。

寓言家克雷洛夫讲：“现实是此岸，理想是彼岸，中间隔着湍急的河流，行动是架在川上的桥梁。”教育者怎样通过“行动”，去达到“桃李不言蹊自成”的彼岸呢？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张很好的考卷。

贵以长善救其失

——长与短

一个凶手被绑赴刑场处决时，沿途看热闹的人不少，有一个老太太突然叫道：“这个小伙子长得真漂亮！”话音未落，即遭到周围看客的反驳：“既是凶手，怎么会漂亮？你这个丑恶的念头是从哪里来的？”“谁说凶手漂亮，谁就是道德败坏！”这是黑格尔在《谁在抽象地思维》一文中，讲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令人捧腹，凶手就必是凶神恶煞，丑陋不堪，即使貌似宋玉、潘安也得说成“猪八戒”、“牛魔王”，岂非怪事？其实，在思想工作中也不乏黑格尔笔下的“看客们”。他们常用绝对的、静止的、孤立的观点看待教育对象。你是先进的吗？好！连脸上的麻子都成了“美人痣”，有所短也是“光荣的缺点”；你后进或者失过足呢，好，“美人痣”也变成了“大麻子”，有所长也挂着个“不光彩”的牌子。

唯物辩证法认为，长和短是互相渗透、互相依存的，有所长即有所短，有所短即有所长，长中有短，短中有长。“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天下没有美得不能再美的美人。古今中外，概莫例外。人们素来以“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一笑倾人国，再笑倾人城”来形容美人。岂不知，西施略嫌脚大，王昭君双肩仄削，貂婵耳垂偏小，杨玉环小患狐臭。美人尚且如是，况他人乎？就拿刘备手下的“五虎上将”来说，关羽能而自负；马超勇而少谋，张飞猛而多躁，黄

忠怕人言老，赵云刚常少创见。就拿《红楼梦》中的尤氏和凤姐相较：论德，尤氏高于凤姐；论谏夫治家，凤姐则长于尤氏了。倘求其全才，则世无可用之人；倘求其完人，则天下恐无配活之人。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既然太阳上也有黑点，‘人世间的事情’就更不可能没有缺陷。”（《生活与美学》第60页）葛洪也说：“西施有所恶而不能减其美者，美多也；嫫母有所善而不能救其丑者，丑笃也。”（《抱朴子·博喻》）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西施脚大、玉环狐臭而否定其美，不能因为秦始皇杀父弑母、李世民杀兄奸嫂而无视其历史作用，也不能因为黑格尔有情妇、卓别林吝啬和嫉妒而把他们说得一钱不值。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允许青年有这样那样一些毛病呢？又为什么象黑格尔笔下的“看客们”那样以短代长、以瑕掩瑜呢？看来，长与短的辩证关系是要弄清楚的。

首先，要弃短取长。《魏子》中讲：“录人一善，则无弃人。采材一用，则无弃材。”薛瑄说：“用人当取其长而舍其短，若求备于一人，则世无可用之人。”李世民所以戡乱世成一统，关键在于用人“弃其所短，取其所长”。刘邦所以胜项羽得天下，亦在于张良、韩信、萧何“施用有宜”。试想，如果让张良冒石矢冲锋陷阵，让萧何坐虎帐运筹帷幄，让韩信治国家、抚百姓、“粮草不绝于道”，恐怕都早已成为项羽的“刀下鬼”或“阶下囚”了。对教育对象也要弃短取长，让能舞者舞之，能歌者歌之，能写者写之，能画者画之，切忌莫让“李逵”去“绣花”，莫让“林黛玉”去抱“风钻”，莫让“鞋匠”去做“糕饼”。因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心尽其畅，才会最大限度地发掘青年的内在“原动力”，抑制其消极情绪和不健康的因素。如果弃长用短，撵鸭子上架，

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一位哲人说过：“取其所长则长愈长，弃其所短则短愈短。相反，则长亦渐短，短愈见短。”一语道破了其中的奥秘。

其次，要短中见长。有道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其实，长短都是相对而言。不照此理就做不好思想工作。一提细菌，人们都有恐惧之感，厌恶之心，因为它是无形“枪弹”，可以无声无息地致人死命。然而，它能够分解动物的尸体，使之变成植物需要的养分，在地层下还能造成石油，这不是短中有长吗？梅里美笔下的女强盗卡门，并不是个正面人物，她身上有某些邪恶的特点，但她却有敢于以死来拒绝那个伪善的文明社会的召唤，这不也是短中有长吗？难怪人们称她是复杂的社会底层中开出的一朵“恶之花”。现实也不例外，一些后进、失足青年，甚至一些犯罪青年良知也未必全然泯灭，在他们那些错误的言行或者邪恶的罪恶事实背后，仍然可以洞见其“美”与“善”的“火花”，尽管有时这“火花”极其微弱，极其暗淡，但它毕竟是“火花”，可以燃起“希望之火”，照亮人生的坦途，因为纯属“暗夜”的心灵是并不多见的。曾记否，在东北火舌正在吞噬着一切的时候，有个小偷趁火打劫。可是，当他看到人们奋不顾身地扑火时，他良心发现，毅然投入了扑火的行列。这还不是那心灵“火花”的“骤燃”和“裂变”吗？如果只见长中之短，不见短中之长，那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短点什么东西了。

再次，要以长教短，亦称取长补短，或补短借长。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转化观点，长与短都具有两重性。不论长或短都包含着长和短两种因素，这两种因素互相贯通，存在一条由此达彼的桥梁。两者既相互依存，又相互转化，

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长与短双方都可以相互转化。要使短转化为长，就必须具备发挥长的作用的条件。只要长能“慷慨陈词”，短就变得“默默无声”；只要长能“龙腾虎跃”，短就变得“寸步难行”；只要长能“熠熠闪光”，短就变得“黯然无色”。甘肃中医学院学生马启昕，曾带着“非党非团”的思想，潜心作学问，走上了写诗的道路，并以诗人自居，以陶潜自喻，过起了“隐居”生活。一位老编辑看到了他“世人皆醉我独醒”的短，又看到了他酷爱诗歌的长，便把他引入诗的殿堂，又从诗的殿堂引向社会，帮他打开“世外桃园”的大门，坚定了跟党走的决心，坚决要达到“既圆又党”的目的。这就是一个以长救短的例子。古人讲的“长善救其失”，就是这个道理。诚然，青年人皆有失，但谁又无长？如果我们都象这位老编辑那样以“长善救其失”，也同样能够打开一些人禁闭的“心灵之门”的。

又次，要以短激长。以短激长，也是使短向长转化的一个方法。在刘备夺取汉中的作战中，诸葛亮就利用黄忠忌人言老之短，使用激将法，调动了黄忠智勇之长，把进攻葭萌关的曹军杀得大败，并一举夺取了曹操在汉中屯积粮草的战略要地——天荡山。作战中以短激长能收殊效，我们完全可以引进到思想工作中来。比如，利用一些青年虚荣心强之短，激起重视人生价值、争先创优之长；利用一些青年重视“自我设计”之短，激起发奋自强、乐为人民做奉献之长；利用一些青年顶撞领导之短，激起强烈的民主意识之长；利用一些青年热衷于读武侠、爱情、侦破小说之短，激起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科学技术、立志成才之长等等。克劳塞维茨说过，每个军人都具有强烈的荣誉感和英雄主义精神。而这种荣誉感和英雄主义精神一旦爆发

出来，就会变成不可阻挡的力量。以短激长，正是撞击这种激情之“火”的“燧石”，引爆勇气之“药”的“导火索”。以短激长，是带兵作战的一种艺术，理所当然，也是思想工作的一种艺术。

我们强调短中见长、弃短取长、以长救短、以短激长，但更要禁忌由长变短。由长变短的天敌是满。《易·丰卦》讲：“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讲：“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家语六本孔子语》讲：“凡持满而能久者，未之有也。”关羽之辱，项羽之悲，不都失之于一个“满”字吗？要防止青年其长变短，除了让他们知道一个自满的人总是在自满里毁了自己之外，就是教育者不要把青年之长看得太长，那不是爱，而是害了；那不是助长，而是抑长了。信阳陆军学院学员张本和有一段话很富哲理：“请你们向舆论界呼吁，不要把我们战斗功臣的思想说得十全十美，坚定信念的洗礼不仅仅在战场上，人生的考验并非只有一次。谁要幻想，经过了生死考验，就能永葆对党对人民的忠诚，那就很容易陷入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泥坑。有句戏文说：翻过一座山，又是一道河。如果领导和教员能这样认识我们，对经过战火考验的青年的进步将会大有益处。”看，青年同志都没有把自己看满，但愿我们也不要那些先进的青年看满。如果那样，青年的结局多半是不幸的，自然自己的结局也不会多么妙！

照此看来，一些在长与短上“蹬跷板”的同志，多半是耳朵根子软，缺少哲学的主心骨。那么，是否应该“生当自有主心骨，何必随人论短长”呢？